



香港孔教学院：现代民间儒教的基地

(2007-7-16 16:06:45)

作者：韩星

。为了思考和探讨儒学及儒教复兴的道路、方法与途径，我常常苦思苦想，有时辗转不眠，儒学及儒教的复兴与传播成为我倾注心力的苦心追求与梦想。因为它的实现与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统一，确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把它作为生活中的第二事业来做，……” 以上都充分说明海外孔教运动是抱着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把儒学及儒教的复兴与传播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并自觉地以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最高目标，这与大陆儒教派确实是南辕北辙的。

港台现代新儒家和海外华人中的孔教活动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维系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的两方面的力量，他们一在学术界，一在民间，一走哲学之路，一走宗教之路，一倾向于人文理性，一倾向于情感信仰，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贡献，各有局限。

关于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或是否是儒教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为问题，说明这是从西方文化背景出发的问题意识。现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的肯定是有个历史过程的。第一代学者由于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尚近，受五四激烈的反系统礼教，反孔教、反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以不同的西方学术文化背景，主要是从哲学层面肯定和阐发儒学的。前期的几位代表人物实际上都是贬抑宗教的，认为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找到了“宗教”的替代品，所谓“伦理代宗教”、“哲学代宗教”，等等。他们对于“宗教”的认识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认为宗教的功能在于“情感的慰藉”，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此种“慰藉”是一种“精神鸦片”，而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则肯定此“慰藉”在调剂人生方面的功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第二、三代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创识就是从超越性、信仰性及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论证儒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宗教性。他们身处西方文化的语境当中，认识到西方文化中最有底蕴和深意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宗教。同时，在西方宗教意识与宗教价值的启发下，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与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开始以新的视域认识、发掘、诠释儒家、儒学中所蕴含的宗教精神。三代现代新儒家对西学的回应由对抗，逐渐转变成理解中的对话，汲取中的发挥，对话亦由被动变为主动，不断显示着中国文化在被西方打败后一步一步艰难崛起的过程。总体上看，他们不同意把一元宗教的“外在超越”移植过来，而是充分重视儒学在凡俗世界中体现神圣的特点，充分发挥儒学中许多未被认识的珍贵资源，以求在与现代世界沟通中寻求儒学以及传统文化的出路，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指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和复兴，对中华民族功莫大焉，这是值得肯定的。

应该看到，他们毕竟不是要把儒学宗教化，也没有传教士、宗教信徒那样直接进入宗教当中，也不是象那些宗教人类学家、宗教社会学家那样去做宗教方面的实证研究，他们对儒学的宗教性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儒学的宗教化，进行宗教组织活动可以说是反对的。如牟宗三就批评说：

康有为的思想怪诞不经，大而无当。陈焕章于学术思想上亦无足称。他们不知孔教之所以为孔教之最内在的生命与智能，只凭历史传统之悠久与化力远被之广大，以期定孔教为国教。一个国家是需要有一个共所信念之纲维，以为立国之本。此意识，他们是有的。此亦可说是一个识大体的意识。但其支持此意识之根据，却是外在的。孔教之生命与智能，自明亡后，即已消失。在有清三百年中，孔教实只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传统。康与陈之道德宗教之体验与认识实不足，思想义理亦不够。他们的心思尚仍只是在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制约中，而不能超拔，故其根据纯是外在。①

牟宗三对康陈二人要为国家立一个共同信念来作为立国之本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对康陈二人只注意孔教外在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而对孔教内在的生命与智能，茫味无知，把握不住表示不屑。事实上，孔教运动以宗教为形式弘扬儒学与现代新儒家在知识界中弘扬儒学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是相映成趣。与现代新儒家比较起来，孔教派在学术思想方面显得薄弱一些，但在实践上则突破了现代新儒家只停留在学院书斋的局限，形成了儒学复兴的另一道风景线，我们应该站在学术史的角度给予客观的肯定。

以孔教学院为代表的海外孔教是一种曾经在殖民地的强势文化以及今天多元文化的氛围中成为海外华人心灵的寄托，感情的归宿，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于不堕的象征。据许多出访海外的大陆学者反映，海外华人有一种心态，最怕大陆的学者去讲儒学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宗教它就不能与当地的其他宗教平起平坐，争取平等，华人就没有一个合法的精神活动的场所了。在有些国家，华侨的孩子出生时报宗教信仰为儒教或孔教，当地政府如不承认儒教或孔教是宗教，就会给他们带来诸多困难。因此，许多海外华侨希望中国宣布儒教或孔教是宗教。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仍然还在争论，大陆的历史和现状又使得官方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使得儒教问题就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和方向问题。

海外孔教在思想理念上是以前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为教主，实际上是以孔子的伟大人格和思想为依归，本质上是人文道德的，是以宗教的形式传承和发挥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它与历史上的儒教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与儒学有更直接的承续关系。他们把儒学变成一种“宗教”，在很大意义上是在宗教的活动方式上，在宗教的组织形式上来宗教化，而不是把它神学化，不是在理论上思想上把孔子神化，把孔子的学说变成神学，进行顶礼膜拜，搞成迷信——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孔教运动是传统儒学的民间化、现代化，在思想上仍然保持了传统儒学人文主义的基本品质。孔教运动及其思想有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孔教在海外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排除让大陆承认孔教的一席之地，即政府承认其合法性，以宗教自由政策让其在大陆自主发展。让孔教以宗教形式在大陆民间发展最起码比让基督教在民间的大肆扩张要更符合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利益，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孔教毕竟只是儒学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宗教一脉，并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方向，也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能走宗教的道路，应该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文化，构建21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

张立文主编《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上下），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11版。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关闭窗口\]](#)